

土屋太祐 著
(日本)

北宋禅宗思想 及其渊源

儒道释
博士论文丛书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土屋太祐（日本） 著

北宋禅宗思想及其渊源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宋禅宗思想及其渊源/土屋太祐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08.12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ISBN 978-7-80752-264-5

I. 北... II. 土... III. 禅宗—思想史—研究—中国—北宋
IV. 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6907 号

北宋禅宗思想及其渊源

BEISONG CHANZONG SIXIANG JIQI YUANYUAN

土屋太祐 著

责任编辑 谢正强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28) 85011398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9.25

字 数 21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52-264-5

定 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编委会

主 编：汤伟侠（执行） 卿希泰（执行） 罗中枢

副主编：唐大潮 李 刚 潘显一 詹石窗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尤汉基	邓锦雄	冯 杰	汤伟奇
汤伟侠	余孝恒	吴景星	李 刚
陈 兵	陈国超	张泽洪	张 钦
罗中枢	周田青	赵志鋈	赵耀年
段玉明	段志洪	钦伟刚	卿希泰
唐大潮	翁永汉	郭 武	黄小石
梁赞荣	盖建民	詹石窗	潘显一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由香港圆玄学院资助出版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缘起

国家“985”二期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
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首席科学家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编委会主编 卿希泰

儒道释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它对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共同感情和强大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均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我们几千年来战胜一切困难、经过无数险阻、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武器，在今天仍然显示着它的强大生命力，并在新的世纪里，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彩。

自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路线以来，我国对儒道释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许多博士点，使年轻的研究人才的培养工作走上了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轨道，一批又一批的博士毕业生正在茁壮成长，他们是我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一支强大的新生

力量，是有关各学科未来的学术带头人。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有一部分在出版之后，已在国内外的同行学者中受到了关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但因种种原因，学术著作的出版甚难，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学术著作出版更难。因此还有相当多的博士学位论文难以及时发表。不及时解决这一难题，不仅对中青年学者的成长不利，且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学术交流也不利。我们有志于解决此一难题久矣，始终均以各种原因未能如愿。近与香港圆玄学院商议，喜得该院慨然允诺捐资赞助出版《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这将是学术界的一大盛事，长期坚持下去，必然会产生它的深远影响。

本丛书面向全国（包括港澳台地区）征稿。凡是以研究儒、道、释为内容的博士学位论文，皆属本丛书的出版范围，均可向本丛书的编委会提出出版申请。

本丛书的编委会是由各有关专家组成，负责审定申请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入选工作。我们掌握的入选条件是：（1）对有关学科带前沿性的重大问题作出创造性研究的；（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重大突破、得出新的科学结论从而推动了本学科向前发展的；（3）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对学科建设具有较大贡献的。凡具备其中的任何一条，均可入选。但我们对入选论文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要求，这就是文章观点的取得和论证，都须有科学的依据，应在充分占有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并详细注明这些资料的来源和出处，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避免夸夸其谈，华而不实。我们提出这个最基本的共同要求，其目的乃是期望通过本丛书的出版工作，在年轻学者中倡导一种实事求是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学术研究的严谨学风。

由于编委会学识水平有限和经验与人力的不足，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恳切希望能够得到全国各有关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以及博士研究生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加强联系和合作，给我们推荐和投寄好的书稿，让我们一道为搞好《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的出版工作、为繁荣祖国的学术文化事业而共同努力。

2005年8月5日于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
研究创新基地、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出“羅”置於。羅於兩武交序。宗韓日中於錄其終十回贈更姓

在去年四川大学文新学院举行的一场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有一篇论文引起了答辩委员会教授们的交口称赞，这就是土屋大祐君的《北宋禅宗思想及其渊源》。的确，无论是思想观点的新颖独创，文献解读的准确允当，还是语言表达的流畅规范，这篇论文在同期毕业的若干博士生论文中都显得十分突出。

我为土屋君感到高兴。在评审他的论文的过程中，我时常有冷水浇背的感觉，惊诧于其思路的独特与大胆。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土屋君敢于对中日学术界已有禅宗思想史研究著作的研究范围和叙述方式提出质疑和挑战。针对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利用敦煌文献的“新出”而且“更古老”的资料去揭破禅宗“伪史”，从而致力于“初期禅宗”研究的倾向，他有意选择“祖师禅”时代的思想史作为讨论对象，挖掘“伪史”中隐含的历史信息，着意从“禅问答”解读中去揭示北宋禅宗的历史真相。针对一些著作以禅宗语言解释禅宗思想的“同义反复”的叙述陷阱，以及介绍宗派嗣法关系的外在概括性叙述套路，他选择了从思想史角度对禅宗各派之间的内在演变脉络进行辨析的全新方法，这

种辨析深入到各种禅宗文本之间言句的细微联系和区别，从而超越五家七派的外在藩篱。于是，令人头痛的“三句”，玄妙的“活句”，缠人的“葛藤”，以及神秘的“昭昭灵灵”等等，其思想性质和内在逻辑便随着土屋君的娓娓叙述迎刃而解。

土屋君论文所取得的成就，当然与他的聪明和勤奋有关，但我更倾向于将其看作中日禅宗学术交流的结晶。所谓“结晶”在两个层面上表现出来：其一，土屋君是东京大学和四川大学共同培养的学生，在日本和中国先后受到风格不同的严格的学术训练。其二，土屋君论文的选题参阅了大量中日学者的著述，受到中日学者不同的学术思路的启发，兼收并蓄，去粗取精，获益良多。

自20世纪50年代初胡适与铃木大拙著名的禅学论争以来，中日学者之间的禅学研究交流已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不过，中日禅学者之间的互访，大约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真正多起来。据我所知，日本的几个禅学研究重镇如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花园大学和驹泽大学的禅文化研究所，先后接待了不少前去访问或进修的中国学者。其结果是，铃木大拙、入矢义高、柳田圣山、忽滑谷快天等一批日本学者的论著相继被翻译为中文，介绍到中国大陆。与此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海峡两岸的学者在禅思想史研究方面也取得可喜的成果，仅在大陆以“禅宗思想史”或“禅宗史”为题的专著便出版了十余种。这些著作也流传东瀛，为日本学术界所熟悉。因此，中日禅学研究的交流，到了本世纪初已具有相当深厚的基础。而土屋太祐君便是在日中禅学交流的背景下取得中国博士学位的第一位日本留学生，这的确令人欣喜。

我与土屋君相识于2002年春。那时我在大阪大学从事中国佛教禅宗与宋代诗歌关系的研究，受花园大学衣川贤次教授的邀请，前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为《祖堂集》读书会作一次学术报告，题目为《习禅：见月忘指——中国佛教解释学研究》。为我的报告作笔头翻译的正是年仅二十多岁的土屋太祐，这令我感到惊讶，因为其中涉及的有些内容是很难翻译的。他当时在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读研究生，师从末本文美士教授，研读《碧岩录》及其他禅宗典籍。后来才发觉，与我这个客串禅宗研究的外行相比，年轻的土屋君对禅宗历史的理解以及思考的问题似乎要深入得多。就在那一年夏秋之际，他由日本文部省推荐，得到中国政府奖学金的资助，到四川大学留学，跟从项楚教授进修。又过两年，出于对项楚师严谨学风的认同以及学术水平的崇敬，他正式在四川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我名副其实的师弟。我于2003年秋回国，与土屋君的交流更多一些。其间，我仿效日本学界读书会的办法，开设“宗教文学研究”课程，细读《石门文字禅》的原文。土屋君认真参加讨论，并提交课程论文，其水平令人刮目相看。

在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时，土屋君选定了“北宋禅宗思想史研究”的题目。这是一个颇为老一代学者所轻视甚或鄙夷的课题。因为在不少禅学专家的眼中，禅思想发展到五代便再也没有新的东西，接下来的北宋，无非是思想方面的停滞和僵化，语言方面的框子和套语，以及文献方面的妄改和伪造。土屋君在报告中批评了中日学者的这种成见和偏见，提出自己一系列的设想和打算。我听了他的报告兴奋不已，尽管这只是初步设想，但已展示出他独立思考的问题意识和创新能力。

祖师思想的原貌和早期禅宗的信史固然值得重视，然而若真要讨论禅宗对于佛教中国化的贡献，讨论禅宗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的意义，也许研究经过宋人整理和篡改的禅籍——即所谓“伪史”会更有价值。我始终相信，除了所谓“真实”的历史外，还有一种“阐释”的历史。放弃或轻视对宋以后禅籍的整理和禅思想的探讨，就好比研究儒学而把整个宋代经学排除在外一样荒唐可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屋君的选题极具学术的挑战性和前瞻性。而他论述的切入点，如关于“三句”的考察、“活句”思想的分析、“无事禅”的批判、“公案”形成的叙述以及其间连续性、联系性的内在脉络的探讨，已充分昭示了宋代禅宗思想研究的广阔前景。

在开题后的两年间，我不时拜读土屋君撰写的单篇论文，如《玄沙对“昭昭灵灵”的批判再考》、《宋初禅宗的思想与临济宗黄龙派的革新》等等，我虽然名义上是半个老师和师兄，却往往从他的文章中得到教益。比如关于“扬眉瞬目”，拙撰《禅宗语言》曾将其视作流行于禅门的普遍的“动作语”，而读了土屋君的论文后，才意识到这只是马祖“作用即性”思想的表现，并受到石头一系的批判。后来我参加马祖禅文化研究讨论会，提交《普请与参禅——论马祖洪州禅“作用即性”的生活实践》一文，便参考了土屋君的观点。至于黄龙派几位师兄弟祖心、克文和常总思想的区别，过去我是未曾留意的，看了土屋君的论文，才恍然意识到北宋临济宗内部“文字禅”和“无事禅”对立的原因，这对我撰写《惠洪“文字禅”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一文颇有帮助。

我思考问题摆脱不了文学立场，而对宋代禅宗思想脉络的研

究始终兴趣不大。本来可以跟土屋君有更多的讨论机会，但后来忙于杂事便渐渐疏于往来。因此，当我得到土屋君博士论文而有幸一窥全豹时，顿然感到眼前一亮，以前种种关于宋代禅宗思想的零散知识，突然之间被串成一个有机整体，这种感觉真是“妙处难与君说”。

土屋君在成都生活了整整五年，学会了吃麻辣烫，熟稔了民情风俗，并稍微能听懂几句四川话，朋友们也把他看作半个成都人。去年别后，我们虽然还有邮件往来，但要见面叙谈却很难了。近日，土屋君的博士论文即将由巴蜀书社出版，他来函嘱我作序。这本书的学术价值读者自会评判，用不着我饶舌。在此仅将我与土屋君之间一段学术因缘拈出，权且作为远隔重洋的怀念和期待，并祝愿中日学术交流结出更美的花朵！

梦蝶居士周裕锴书于四川大学竹林村锅盖庵

2008年7月

前 言

关于禅宗思想史，不管是中国大陆、台湾，还是日本，都有众多研究著作，简直令人眼花缭乱，但就其研究情况而言，这十几年来似乎没有相应的收获。葛兆光先生在《历史、思想史、一般思想史——以唐代为例讨论禅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一文中说：“在汉语学术界中，近年来出版的禅史研究著作已经相当多，不算较早的胡适和印顺，也不算八十年代以前零零星星的研究和翻译，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大陆，仅成专书者，就有十几种，在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1986）之后，就有洪修平《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1991）、潘桂明《中国禅宗思想历程》（1992）、杜继文和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1993）、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1995）、麻天祥《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1997）、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1999）……就连海峡对岸，也出版了蔡日新的《中国禅宗的形成》（2000）和刘思果《禅宗思想史概说》（2001）……可是，我却感到，无论在出版和发表上如何热闹，在研究水准上似乎进展并不大，大多数这类著作，

想法雷同，问题仍多，仿佛旧症结没有消肿，新毛病却又在出现。”^① 本人并不认为这些著作都没有任何创见，但即使有，也是局部的，正如葛先生所说，在大方向上没有引人注目的创新。因此，笔者不打算一一讨论这些作品的内容，而要重点介绍构成学科史主流的作品，并加以评论，借以明确以往研究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1930年，胡适发表《神会和尚遗集》，禅宗研究从此迎来了新时代。其序云：“今日所存的禅宗材料，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是北宋和尚道原、赞宁、契嵩以后的材料，往往经过了种种妄改和伪造的手续，故不可深信。”^② 基于这样的想法，胡适在敦煌出土文献中寻找出早期材料，从而叙述了新的唐代禅宗史。胡适禅学的重点是简单明了的，即他用更古老的资料来推翻后来被编造出来的伪史。从前禅宗史研究确实没有这种客观研究。就此一点来说，胡适的确开辟了禅学近代化的道路。

但是，暴露禅宗的伪史并不是禅宗史研究的一切。其实“伪史”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现象，所谓“伪史”中也保留着众多历史信息。如果只是把那些较晚出现的材料当伪史来抛弃的话，我们永远不能理解“伪史”背后隐藏的真历史。对这个问题，柳田圣山先生有明确的认识。柳田先生1967年发表的《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③一书是其代表作。我们要注意，该书并不是对“初期禅宗史”的研究，而是对“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

① 《唐研究》第八卷，2002年，第1页。

② 1930年。今用《胡适学术文集》所收本，姜义华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63页。

③ 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京都：法藏馆，1967年。

柳田先生认为：脚踏实地的历史研究工作当然要重视古老的资料，但古老的资料也不一定可以深信，尤其是在宗教方面的文献中，同时存在史实与传说。我们要警惕以传说为史实的错误，但与此同时也要反省把传说当作虚构而弃之不顾的愚蠢。宗教上传说的发生，绝不是任意或偶然的，我们倒是需要研究那些传说出现的历史社会背景及心理或文学上的理由。于是，柳田先生致力于对初期禅宗史资料的研究，刻意弄清各种资料的性质，并在此过程中还原初期禅宗史的本来面目。其实，史学领域中早就有这种研究方法，但对禅宗史研究来讲，柳田先生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此类著作中值得一提的还有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①，也许它是为数不多的称得上“禅思想史”的著作。葛先生用“人心与佛性的关系如何”、“在从人性到佛性的趋近的过程中，修行方式如何”、“成佛的境界如何”的三个标准来衡量各时代的思想。其结构很简洁，便于掌握禅思想在整体上的发展趋势，与不少研究著作单纯地罗列事实不同，该书成功地描写出了禅宗思想史的连续性。历史是不断产生反应的过程，一个事象是对上一个事象的反应，同时也引起下一个反应，这种反应的连锁一刻也不停止，因此，我们必须在其演变的过程中掌握历史，要不然，不能给予正确的评价。从这一点来看，该书确实是一本良好的研究著作，就禅宗思想史而言，这种研究实在不多。

但这部著作也并不是没有问题。它的问题，其实也是以上三

①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位学者共同的问题，即研究范围上的局限性。以上所谓“初期禅宗研究”是以新资料的发现为标志的。这种研究背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利用敦煌文献等“新出”而且“更古老”的资料去揭破“伪史”，才符合“科学”标准。其实，柳田圣山、葛兆光两位先生虽然都刻意去克服初期禅宗研究中存在的这种窠臼，但在其研究范围上似乎尚未跳出胡适的框架。禅宗的历史，按照其资料的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主要以敦煌文献为资料的“初期禅宗”，其范围是从达摩到南北宗的争论。二是马祖以后的时代，现在暂且把它叫做“祖师禅的时代”。其资料基本上都是后人所记录，内容则主要是那种玄之又玄的“禅问答”。当然也有不同的资料，比如说黄檗希运《传心法要》等书。这些资料不是后人所记录，可看作是同时代资料，但其数量毕竟不多。三是宋代以及其后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禅师是祖师禅资料的记录者。他们也拥有丰富的同时代资料。就以上三个时代的资料性质而言，初期禅宗和祖师禅时代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就祖师禅的时代而言，其资料上的限制是很明显的。关于这一时代的现存资料多半是后人所记录，又没有足够的同时代资料，这种资料的不确定性是阻碍祖师禅研究的原因。

祖师禅以后的时代之所以难以研究，不仅因为其资料的性质与记录者有问题，更重要的原因是语言性质的问题。这个时代的资料都是那种玄妙的“禅问答”，看不出多少逻辑思维。也许胡适等学者以为如果把初期禅宗的研究做好了，就自然而然地能够了解中后期的禅思想，但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对初期禅宗的研究并没有给我们很多解读玄妙语言的线索。末木文美士先生指出：“（初期禅宗的研究）有敦煌文献这种同时代资料，以它为标准来

确定事实。但这种研究方法，对以后的时代来说，并不是最有效的，因此我们需要新的研究方法。”^① 要想解读《祖堂集》、《景德传灯录》等最基本的禅宗资料，我们似乎需要采取与胡适等人不同的路线。

以上，笔者已经指出了禅宗研究的两个缺陷，一是研究范围的问题，二是研究方法的问题。以下，作为研究范围问题的一部分，我们来看一看有关宋代禅宗的研究情况。如果顺着胡适的思路去思考的话，我们就会想到这样的研究路线：有关“祖师禅”的记录者是宋代禅师，因此这些资料中多少反映了宋代禅师的主观。那么，我们应该首先研究宋代禅师的思想，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他们所记录的资料。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利用中后期资料，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宋代禅宗史的研究。但实际上对它的研究还很薄弱。虽然在魏道儒《宋代禅宗史论》^②，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③，伊吹敦《禅の历史》^④ 等著作中都有关于宋代禅宗的记载，但其研究基本上只是介绍宋代禅师的嗣法关系和“黄龙三关”等口号而已，很少深入研究思想内容。末木先生说：“唐代初期禅宗的研究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与之相比，宋代禅宗的研究还远远落后。当然有石井修道的研究等不少优秀的成果，可是，对于宋代禅与唐代禅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与唐代禅宗相比宋代禅宗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等问题，我们似乎未必有

① 末木文美士《禅の言语は思想を表现しうるか——公案禅の展开》，《思想》第960号，东京：岩波书店，2004年，第34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1990年。

③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④ 京都：法藏馆，2001年。